

# 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编选释氏诗歌考论<sup>\*</sup>

李舜臣

**内容提要** 虞山钱谦益凭借着丰富的藏书和与丛林人士的广泛交谊,复得东南文献家的襄助,广泛搜讨,精细考订,在《列朝诗集》中编选了108名释氏诗人的1349首诗歌,并撰写诗人生平。《列朝诗集》所编选的释氏诗歌,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,还清晰地反映出明代僧诗创作的发展态势,体现了钱氏独特的僧诗审美旨趣。虽间有遗漏、舛误、取弃未允等现象,但相较于其他相关的明代诗歌总集,《列朝诗集》仍是我们研究明代释氏诗歌的“渡河之筏”。

**关键词** 钱谦益 释氏诗歌 《列朝诗集》《明诗综》

《列朝诗集》是虞山钱谦益编选的明代诗歌总集。是集仿元好问《中州集》之例,以诗系人,以人系传,不仅“使一代诗人精魄,留得纸上”<sup>①</sup>,钱氏之苦心孤诣亦深植其中,故历来为文史学家所重视。发覆其文献价值与诗史价值,表曝牧斋之心迹者,代不乏人。《列朝诗集》分乾、甲、乙、丙、丁、闰六集,前五集之编排,确实运思独深<sup>②</sup>;而闰集之僧道、香奁、外夷等,除略含轻视外,殊难见其深意所在<sup>③</sup>。不过,闰集的编选,精审赅博,所收诗人诗作亦颇具特色,充分展示了明代除文人外其他诗人群体的风貌<sup>④</sup>。本文拟围绕闰集所收释氏诗歌,探讨其文献来源、选诗旨趣及文献价值,冀望对推进明代释氏诗人和《列朝诗集》的研究,略有助益。

## 一 编选的文献来源

钱谦益编纂释氏诗歌的起讫时间,难以考实。不过,它或许是诸集中编定时间较早的部分<sup>⑤</sup>。钱

<sup>\*</sup>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历代释家别集叙录”(项目编号14BZW085)、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“元明清释家别集提要”(项目编号教古字[2014]097号)、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“禅宗与诗学研究”(项目编号JD14274)阶段性成果。

① 钱谦益《钱牧斋先生尺牍》卷一《与周安期》,钱谦益著,钱曾笺注,钱仲联标校《钱牧斋全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,第7册,第236页。

② 关于此问题,参见澹归和尚著,段小华点校《遍行堂集》卷八,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,第1册,第204页;李慈铭《越缦堂读书记》卷八,上海书店2000年版,第608页;陈寅恪《柳如是别传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,第987页;严迪昌《蒙叟心志与〈列朝诗集〉之编纂旨意》,《语文知识》2007年第4期。

③ 历代诗歌总集常将这些诗人附于卷末,已含轻视之意;钱氏复冠之以“闰集”,“闰者,闰位余分也”,轻视之意,似更明显。

④ 关于《列朝诗集》的研究,学界的成果比较丰厚,参见容庚《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》(《岭南学报》1950年第11卷第1期),王琳、孙之梅《〈列朝诗集〉述要》(《山东师大学报》1995年第5期),孔爱峰《钱谦益〈列朝诗集〉的编纂学研究》(苏州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)等;关于闰集中香奁诗的研究,参见潘冬梅《文本·作者·性别:浅议〈列朝诗集·闰集〉香奁部分的编选和时代》(《中国文学研究》2005年第2期);而关于释氏诗歌的专门研究,目前尚未及见。

⑤ 《列朝诗集》“彻简”于顺治六年(1649),刻成于顺治九年(1652)。

氏在与毛晋的书信中说：“顷又附去闰集五册、乙集三卷。闰集颇费搜访，早刻之，可以供一时谈资也。”<sup>①</sup> 释氏诗歌，向来不为正统文人重视，即便佛门内部亦视为“小道”、“外学”，难入经藏殿堂。职是之故，历朝释氏别集散佚极为严重，僧诗总集之编撰尤且艰难，非苦心发志、黽勉不辍者，难克其功。

钱谦益一生枕席经史，其绛云楼藏书之富，大江以南，推为第一。他“发其家所藏故明一代文集”，精编细选，以成《列朝诗集》。据《绛云楼书目》载，牧斋所藏明代释氏别集有用章《淄川集》、支新《雪庐稿》、来复《蒲庵集》、宗泐《全室外集》、清澹《望云集》、鲁山《野庵集》、德祥《桐屿诗集》、宗林《朽庵集手稿》数种<sup>②</sup>。《绛云楼书目》中“明人文集”之部为松陵潘云厚割去而散佚，故此份书目所载明代释氏别集应非全帙。牧斋暮年“键户注佛经”，于书无所不采，甚至“禅林皆推为该博”<sup>③</sup>，所藏明代释氏别集当远不止以上几种。

钱谦益不仅是艺苑宗工，亦为护法金汤。他十八岁阅《首楞严经》，“忽发深省，即夜梦见世尊”；三十六岁交憨山德清，“颇受记莛”，德清赞曰：“我东游得钱某，刹竿不忧倒却矣。”<sup>④</sup> 钱氏别号“聚沙居士”、“葺庵道人”、“没口居士”、“峨嵋老衲”，则其涉佛之深，诚不难想见。明末高僧雪浪洪恩、憨山德清、紫柏真可、觉浪道盛、宗宝道独及其法子、法孙皆与其交谊甚深，造访索文者，络绎不绝。检《钱牧斋全集》，钱谦益所撰僧人塔铭、碑传 17 篇，僧人别集、佛经注疏序跋 45 篇，与僧人书信 43 通，并捐刻或雕勘了道衍《道余录》、德清《梦游集》、真可《紫柏真者别集》等，足见他对释家文献的重视。

作为东南文献之归，钱谦益与瞿汝稷、曹溶、毛晋、钱曾、黄虞稷等著名藏书家，过从甚密。《列朝诗集》能有今日之面目，与这些文献家之慨然襄助，密不可分。顺治五年（1648）秋，牧斋讼系金陵，发起了所谓的“采诗之役”，半载间，四方搜讨，“所得不赀，大率万历年名流篇什可传，而人间不知其氏名者，不下二十余人，可谓富矣”<sup>⑤</sup>。例如，他从黄虞稷借书，“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”<sup>⑥</sup>。黄氏千顷堂藏书六万余卷，尤以明人撰述为多，其所撰《千顷堂书目》<sup>⑦</sup> 著录了 136 名明代释子的一百六十余种别集，是迄今搜罗明代释家别集最富之书志。再如，牧斋门人毛晋不仅是《列朝诗集》的刊刻者，其汲古阁亦荟萃天下善本珍籍，并刻有宋李鼎《唐僧弘秀集》、元释圆至《牧潜集》、明释妙声《东皋录》、明释通门《懒斋别集》等释家诗文集。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春，毛晋还编撰了《明僧弘秀集》十三卷，其序称：“非敢追蹑和父之规衡，妄效次公之筏喻，惟惧鲸嗜鱼寂，题壁尘埋，辙乱旗靡，锦囊灰灭尔。”可见，毛晋亦是有志于存留僧诗文献者。是集选录自“太祖壬辰（1353）至武宗辛巳（1521）一百七十一季，得一百九十七人，诗一千七百首有奇”<sup>⑧</sup>，虽未及嘉靖之后，但所收明代僧诗数量，有明一代，无有可及者。我们对比《列朝诗集》和《明僧弘秀集》所收诗

① 《钱牧斋先生尺牍》卷二《与毛子晋》（其十八），《钱牧斋全集》，第 7 册，第 305 页。

② 钱谦益《绛云楼书目》卷四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，第 920 册，第 420—421 页。按，以上诸集，唯宗林《朽庵集手稿》与高启《凫藻集》等十八种列于“明初文集类”，其余皆列于“元代文集类”。又，“用章”即廷俊，著有《泊川集》，此处“淄川”当为“泊川”之误。又，“支新”为“克新”之误。

③ 曹溶《绛云楼书目题词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 920 册，第 321—322 页。

④ 金鹤冲《钱牧斋先生年谱》，《钱牧斋全集》，第 8 册，第 931、933 页。

⑤ 《钱牧斋先生尺牍》卷二《与毛子晋》（其三十九），《钱牧斋全集》，第 7 册，第 313 页。

⑥ 钱谦益《有学集》卷二六《黄氏千顷斋藏书记》，《钱牧斋全集》，第 5 册，第 994 页。

⑦ 黄虞稷著，瞿凤起、潘景郑整理《千顷堂书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。

⑧ 毛晋《明僧弘秀集自序》，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汲古阁刻本，第 3a 页。按，洪武间无壬辰年，“壬辰”当指元至正十二年（1352）。是年，朱元璋投郭子兴部，是其发迹之始。因此，是集选入了大诰、宗衍等卒于元末之僧。《明僧弘秀集》现有上海图书馆藏本，很少为研究者注意，笔者将另有专文探讨。

人和篇目,不难发现二者的关系。例如,《明僧弘秀集》选清潞兰江诗17首,《列朝诗集》选20首,重复者达17首;《明僧弘秀集》选同庵夷简诗6首,《列朝诗集》选8首,重复者有5首。这说明钱谦益在编选释氏诗歌时,很可能参考了《明僧弘秀集》。

钱谦益在编选释氏诗歌时,还借助了明代其他的诗歌总集。《列朝诗集·净圭小传》下注云:“见朱存理《铁网珊瑚》。”《怀海小传》下注:“见《声文会选》。”《仁淑小传》下注:“见吴兴沈士儒《皇明诗选》。”《法智小传》下注:“见《续三体诗》。”《小萍庵文贞小传》云:“文贞,字莲生……住小萍庵,汇辑《携李禅林诗》。”《携李禅林诗》今已佚<sup>①</sup>,钱氏在撰写僧人小传时,多引小萍庵文贞语,或即出自此书<sup>②</sup>。此外,万历间释正勉、释性涵所编《古今禅藻集》,亦是钱氏参考的重要书籍。例如,《列朝诗集》选有古春如兰诗作22首,所选律诗8首,与《古今禅藻集》卷二二所选完全相同,且次序亦同,应是钱氏直接移录。不过,需指出的是,钱氏虽受这些总集的影响,但他绝非仅抄撮选本而成书者,其别裁去取,自有主张。

总之,钱谦益凭借丰富的藏书和与丛林人士的广泛交谊,复得东南文献家之助,广泛搜讨,严加考订,从而为《列朝诗集》释氏诗歌的编撰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。

## 二 明僧诗史观

《列朝诗集》的编撰宗旨,是“以诗存人”、“以诗存史”。闰集除一以贯之外,复依诗人身份编排,分高僧、道士、名僧、异人、金陵法侣、香奁、宗室、神鬼、外夷等十四类。此十四类诗人中,涉及佛教者,有高僧、名僧、异人和金陵法侣四类。“异人”中有李贽等三人。李贽乃晚明狂禅者,“参求理乘,剔肤见骨”,但行迹不轨,故牧斋仿《中州集》,“录其诗附于高僧之后,传灯所载,旁出法嗣,卓吾或其俦”<sup>③</sup>。“金陵法侣”殷迈、顾源二人,虽严持戒律,精研内典,但皆中年后奉佛,亦非纯似僧人。牧斋如此编排,显然考虑到僧徒游离于僧俗两界的现象,故未可一概而论。而释氏诗人中,牧斋又厘为高僧、名僧两种类型。据其开列的名单,“高僧”者(如楚石梵琦、憨山德清、紫柏真可、云栖株宏、雪浪洪恩等),盖指佛法精深、道行显著之僧;“名僧”(如九皋妙声、鲁山普泰、雪山法杲等)则是“以诗鸣世”但道行平平者。牧斋《山居诗引》曾云:“吾友钟伯敬常言:‘今之僧才一操觚,便有诗僧二字在其鼻端与眉宇间。’若藏公者(汉月法藏),诂可以诗僧目之哉?”<sup>④</sup>在他看来,以“诗僧”视汉月法藏,实有降其志,故特将释氏诗人分为“高僧”和“名僧”两目。所谓“名僧”者,大体即指“诗僧”。钱氏在具体区分僧人时,容或有商榷的余地,但他这样处理确实很贴近古代僧诗批评的语境。

钱谦益对释氏诗人身份的辨析,有时借鉴了梁代慧皎的看法。慧皎《高僧传序录》云:“自前代所撰,多曰名僧。然名者,本实之宾也。若实行潜光,则高而不名;寡德适时,则名而不高。”<sup>⑤</sup>汤用彤进一步申说:“盖名僧者和同风气,依傍时代以步趋,往往只使佛法灿烂于当时。高僧者特立独行,释迦精神之所寄,每每能使教泽继被于来世。”<sup>⑥</sup>“名僧”与“高僧”的区别在于:前者和同尘世,名显于外;后者潜行幽光,高蹈独立。而他们所撰之诗,亦有相当之差异,大体当如清人尤侗所云:“云

① 此书清初犹存,沈季友编《携李诗系》多有征引,其后即未见线索。

② 参见《筠隐遂小传》、《竹浪旭小传》、《雪溪映小传》、《冰如源小传》等。

③ 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闰集卷三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第1624册,第323页。

④ 钱谦益《牧斋杂著》,《钱牧斋全集》,第8册,第865页。

⑤ 释慧皎著,汤用彤校注《高僧传》卷一四,中华书局2004年版,第525页。

⑥ 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,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,第170页。

门、雪窦禅而不诗，惠休、无本诗而不禅。”<sup>①</sup>所谓“禅而不诗”，即高僧之诗；“诗而不禅”，则诗僧之诗也。

闰集所收释氏诗人中，尚有“少师独庵衍公”，颇具争议。独庵道衍，即姚广孝，因辅佐朱棣继承大统，实刘秉忠流，世人亦目之为“缁衣宰相”。然牧斋因道衍“上命蓄发再三，终不肯”，又终生“恪守僧律”，故“列诸释氏，以从公之志，所以崇公者至矣”<sup>②</sup>。是循“春秋知人主之义”也。

《列朝诗集》闰集共编选了108名释氏诗人的1349首诗作，各类诗人中，又大致依时间先后编次。据此，我们可统计出明代各时期释氏诗人的数量，参见〔表1〕：

时期	洪武至洪熙	宣德至隆庆	万历至崇祯	年代不详
诗僧数量	34人	17人	38人	19人
所占比例	31.48%	15.74%	35.19%	17.59%

〔表1〕

从上表看，明代僧诗明显呈现出两头热、中间冷的“马鞍型”态势，即明初（洪武至洪熙）、明末（万历至崇祯）为繁盛期，中期（宣德至隆庆）则相对冷寂。

闰集所选释氏诗歌数量达30首以上者有13人：德祥（172首）、宗泐（108首）、来复（94首）、守仁（71首）、妙声（61首）、法果（57首）、道衍（55首）、梵琦（52首）、德清（46首）、洪恩（44首）、唵嚩香公（43首）、明秀（35首）、宗衍（32首）。除宗衍为元人，属误收（详细考辨见下文），其余12人基本代表了明代僧诗创作的最高水准，除明秀为“弘、正间诗僧”，其余7人在明初，4人在明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闰集所选释氏诗人一般止于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前圆寂僧人，故很多与牧斋相交的清诗人像读彻、函昱、函可皆未选入。易言之，若编选范围更大一些，则明末选诗数量超过30首者定不止4人。因此，从选诗数量看，《列朝诗集》亦大体彰显出明代僧诗发展的“马鞍型”态势。

明代僧诗创作的盛衰轮替之景象，明人亦间有描述。徐泰《诗谈》云：“释来复、宗泐、守仁、梵琦四子，雄深雅健，殊不类僧家之作。我国初诗僧盛矣。”<sup>③</sup> 憨山德清云：“明国初有楚石、见心、季潭、一初诸大老，后则无闻焉。嘉、隆之际，予为童子时，知有钱塘玉芝一人，而诗无传。江南则予与雪浪创起。雪浪刻意酷嗜，遍历三吴诸名家，切磋讨论无停晷，故声动一时。”<sup>④</sup> 从“国初后”到“万历间”，德清所知仅玉芝法聚一人，明中期诗僧之沉寂，可见一斑；万历后，因德清和雪浪的推毂，诗僧蜂起，声动一时，复迎来僧诗创作的高潮。因此，钱谦益所揭示的明代僧诗的发展态势，是符合历史实情的。

明代僧诗呈现出“马鞍型”的态势，与明代佛教发展和文化思潮密不可分。明代佛教，隆盛程度虽不及隋唐时期，但其精光外灿者，仍集中于明初与明末这两个时段。明初，明太祖崇奉释教，其礼遇之厚，“可谓至隆极重”<sup>⑤</sup>；洪熙、宣德之后，佛教的生存境遇逐渐恶化，至世宗崇尚道教斋醮，焚弃佛牙头骨，“释氏之不振极矣”<sup>⑥</sup>；晚明佛教虽因白莲教、罗教等民间教派起义而遭裁抑，但佛教向

① 尤侗《西堂杂俎·杂俎二集》卷四《题随笈草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1406册，第328页。

② 《列朝诗集》闰集卷一《姚少师独庵衍公小传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1624册，第269页。按，此段文字亦见于《明僧弘秀集》卷一四，可见《列朝诗集》与它的渊源非同一般。

③ 徐泰《诗谈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齐鲁书社1997年版，集部第417册，第4页。

④ 憨山德清《憨山老人梦游集》卷四七《梦游诗集自序》，福建莆田广化寺佛经流通处1966年版，第638页。

⑤ 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七《释道·释教盛衰》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，第679页。

⑥ 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七《释道·僧道异恩》，第684页。

世俗社会的渗透已呈不可阻遏之势,除“四大高僧”外,雪浪洪恩、无名慧经、觉浪道盛等人均苦心精勤,撑持法门,如暗室灯火、晦夜星辰,遂使丛林出现中兴之象。此外,明代僧诗的发展态势与明代文化思潮亦形成共振。明代思想界的主流是阳明心学。心学阳儒阴释,王畿、王艮等更是没入禅海,几与佛禅等同。心学之风,偃及天下,在晚明士林中掀起了一股劲盛的禅悦之风,士大夫几乎无有不谈禅者。钟惺即描述道:“金陵吴越间,衲子多称诗者,今遂以为风。大要谓僧不诗,则其为僧不清;士大夫不与诗僧游,则其为士大夫不雅。”<sup>①</sup>此种风气,亦是明末诗僧繁盛之重要缘由。

### 三 选诗旨趣

《列朝诗集》所编释氏诗歌,题材比较丰富,凡酬答、咏物、应制、题画、赠别、山居等,均在钱氏入选之列。若仅就此层面看,似难见出其编选旨趣;但仔细掇拾文献,庶几可忖度之。闰集中僧人小传涉及选诗取向者,约有三条,兹举如下:

道衡,字平方,号西吾。……西吾少时,有诗数十首,不娴格律,时时有道人语。中年率意应酬,殊失本色。余所录者,皆其少作也。

慧秀,字孤松,常熟蒋氏子。……有《秀道人集》十二卷。上人富于辞藻,采摭六朝,多所沾溉,小赋骈语,时足献酬,而意象凡近,殊非衲子本色。昔人言,僧诗忌蔬笋气,如秀道人者,正惜其少蔬笋气耳。

如愚,字蕴璞,江夏人。……曹能始叙其诗,谓其五言律奇险,多慷慨悲愤之句,不作禅语,所以为佳。僧诗不作禅语可也,如石头七言诗吊太白、东坡诸篇,不徒野狐外道,直是牛头阿旁波波咤咤口吻,亦可以其不作禅语而取之乎?“松子诱鼯剥,花神恼蝶过”,鄙俚秽杂,无所不有,道人本地风光,应作如是观否?……余存石头诗,仍附雪浪门徒之后,为渠末后发露忏悔,庶不复定襄一片老婆心尔。<sup>②</sup>

钱氏以为道衡中年后之诗,率意应酬,无僧人本色,故弃而不选;又以慧秀诗辞藻富丽,足以“献酬”,非衲子本色,颇惋惜其少“蔬笋气”;又批评如愚诗未作禅语,鄙俚秽杂,非“道人本地风光”,本无意选之,但因其“末后发露忏悔”,权且附于雪浪门徒之后。于兹可见,钱氏强调的是:僧诗应体现僧人之本色,应有“蔬笋气”。

“蔬笋气”,是北宋以来用以评价释氏诗歌的术语,与之类似者还有“酸馅气”、“菜气”、“僧气”、“衲子气”等,大抵指释氏诗歌“识量小,诗料少”“篇幅狭仄”“意境清苦”“多摄入禅语、话头”等特征<sup>③</sup>。对于此种特质,多数文人都持批评、戏谑的态度。例如,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即云:“近世僧学诗者极多,皆无超然自得之气,往往反拾掇摹效士大夫所残弃。又自作一种僧体,格律尤凡俗,世谓之酸馅气。子瞻有《赠惠(道)通诗》云:‘语带烟霞从古少,气含蔬笋到公无。’尝语人曰:‘颇解蔬笋语否?为无酸馅气也。’闻者无不皆笑。”<sup>④</sup>惟元好问一反公议,云:“东坡读参寥子诗,爱其无蔬笋气,参寥用是得名。宣、政以来,无复异议。予独谓此特坡一时语,非定论也。诗僧之诗,所以自别于诗人者,正以蔬笋气在耳。”<sup>⑤</sup>

① 钟惺《隐秀轩集》卷一七《善权和尚诗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,第251—252页。

② 《列朝诗集》闰集卷三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第1624册,第342、341、331页。

③ 关于“蔬笋气”等术语的探讨,参见周裕锴《中国禅宗与诗歌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,第46—48页)、拙文《“蔬笋气”、“酸馅气”与古代僧诗批评》(《中国诗学》第十辑,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51—59页)等。

④ 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卷中,何文焕辑《历代诗话》,中华书局1997年版,上册,第425—426页。

⑤ 元好问《遗山集》卷三七《木庵诗集序》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第1191册,第430页。

钱谦益的看法与元好问颇为一致,可见他不仅在体例上仿效《中州集》,亦承袭了元氏某些诗学观念。不过,牧斋涵咏僧诗既久,复有参禅体验,实具衲子心态和习性<sup>①</sup>,故认识较元氏更为精深。他说:

昔人言:“僧诗忌蔬笋气。”忌蔬笋之气,而腥浓肥厚之是嗜,僧之本色尽矣,诗于何有?司空表圣有言:“解吟僧亦俗。”而况其未必解乎!吾谓世之为僧者,知所以为僧,而后知所以为诗。为诗僧者,知所以为诗之僧,而后知所以为僧之诗。……有能闻余言而思,思而悔,悔而求其所以为僧为诗者,向所谓蔬笋之气、不离本色者,其应病之药乎?如其不然,吾未如之何也已矣。<sup>②</sup>

牧斋此种观念,在《寄巢诗序》、《后香观说书介立旦公诗卷》、《题介立诗》等文中亦反复伸张。他强调的是,诗僧应具僧人本色,不染文人结习,方能称作诗僧;僧诗则应具“蔬笋气”,如“天弦孤韵,警人人耳”,方不失其本。在牧斋看来,“蔬笋气”最紧要的特征是清寒、玄淡,“惟清惟寒,亦玄亦淡,如佛言食蜜中边皆甜,此其蔬笋气,天然禅悦之味也”<sup>③</sup>。而此种特征非仅摭拾宗门语录、话头者所能有。他说:“今之缁流,多喜为诗。或排列华要,如千佛名经。或摭拾偈颂,如戏科诨。每一触目,辄为赤眚满眼。”<sup>④</sup>又说:“今世多诗人,裨贩数十联排偶,设坛立玷,作大词宗;又多禅人,剽掠数十则公案,铺眉苦眼,号善知识。”<sup>⑤</sup>因此,钱氏在编选释氏诗歌时,摒弃佛赞、偈颂、拈古等,或许不止是出于对诗歌体式的考虑。

钱谦益维护僧诗“本色”的审美旨趣,首先体现在他颇重视高僧之诗的编选。《列朝诗集》共编选了36名高僧的946首诗作,人均26首强;而名僧虽达72人,但诗歌仅403首,人均未足6首。“高僧之诗”与“名僧之诗”,总体呈现出如尤侗所云“禅而不诗”和“诗而不禅”之差异。易言之,高僧之诗与佛禅更显密切,而名僧之诗则更接近文人之诗。《列朝诗集》编选了楚石梵琦《怀净土诗》、《怀净土百韵诗》,憨山德清《六咏诗(心、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、生死)》等阐释佛理之诗;又有劝善化导的白话诗,如憨山德清《担板汉歌》、莲池祿宏《跛脚法师歌》、雪山法杲《十拍歌示彬沙弥》等,均富有鲜明的佛教特色。

更重要的是,《列朝诗集》还编选了大量释家山居诗。我们略作统计,闰集中仅诗题含有“山居”、“水居”等字样的诗歌就有96首,约略占总数的7%;此外,还有更多虽未题类似字样但实际是描写山居生活的诗作,如“闲居”、“咏山”、“溪居”、“住静”等。所选山居诗中,尤以法杲的最为突出,选入了32首。法杲,字雪山,吴门人,著有《雪山草》九卷。今检《雪山草》,山居诗数量极多,且诸体皆备,凡五古107首、五律28首、七律4首、五绝103首、六绝76首、七绝164首,共482首,堪称明代山居诗最多的释氏别集<sup>⑥</sup>。钱谦益不仅选入法杲的山居诗32首,而且选其诗总量为57首,居所有释氏诗人中的第六位,显示出他对法杲诗歌的偏好。此外,在他选入的“有道人语”的道衡中年后的11首诗中,有3首题为《山居杂诗》;在所选憨山德清的46首诗中,亦有山居题材诗13首。钱谦益为僧人所撰序跋中,对山居诗也予以了很高的评价。例如,他评大育头陀诗“山居二十

① 例如,钱谦益《空一斋诗序》中说:“余于诗,老而废业,翻经之暇,辄讽诵寒山子、庞居士、傅大士诗偈,于古人诗,柴桑、辋川、香山而外,间取伊川、江门二家以送老,日助禅悦。”(《有学集》卷二〇,《钱牧斋全集》,第5册,第842页)

② 《有学集》卷二一《普福昌上人诗序》,《钱牧斋全集》,第5册,第888页。

③ 《有学集》卷四八《题介立诗》,《钱牧斋全集》,第6册,第1580—1581页。

④ 《有学集》卷四八《题山晓上座啸堂诗》,《钱牧斋全集》,第6册,第1583页。

⑤ 《有学集》卷二一《松影和尚报恩诗草序》,《钱牧斋全集》,第5册,第884页。

⑥ 法杲《雪山草》,明万历三十八年(1610)刻本。

首最佳，鲜妍清切，骀骀得剑南句法”<sup>①</sup>；又曾静夜读法藏山居诗，“殆如杜子美所谓欲觉闻晨钟，令人发深省者”<sup>②</sup>。山居诗，是释氏诗歌的日常题材。它不止描写幽古清音，林间雅致，亦反映了僧人的清苦境遇，更抒写参禅悟道之风致。因此，钱谦益颇为重视对此类诗歌的编选。

除明初的季潭宗泐、来复见心、同庵夷简等人之外，《列朝诗集》所选释氏诗歌较少涉及社会政治题材。即便在选入数量最多的应酬诗中，亦多是僧侣之间的往还唱和。例如，独庵道衍所撰《逃虚子集》，多涉及世情之作；但《列朝诗集》所选其诗，惟《京口览古》一首，稍见其郁勃之气，余皆写景或与僧侣山人交游之作。总体而言，《列朝诗集》所选释氏诗歌，可谓山林兴味多，而风云之气少，而这正是本色僧诗的主要特征。

#### 四 文献价值

相对僧诗史和僧诗批评的价值而言，《列朝诗集》所收释氏诗歌的文献价值，也十分值得重视。很多僧人的诗作，皆赖是集而存留至今。明代文献卷帙浩繁，我们无法一一评估钱氏保存文献之功，仅就所知略见一斑。例如，钱氏所选诗作数量最多的释德祥，字麟洲，钱塘人，著有《桐屿集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据浙江汪启淑家藏本，著为“《桐屿集》四卷”，但将其黜入存目，致使今日未见传本。德祥的诗，今仅见存于一些诗歌总集，《古今禅藻集》编选了5首，《明僧弘秀集》编选了110首，朱彝尊《明诗综》编选了25首。根据明人别集大约每卷百余首诗的惯例，《桐屿集》四卷收德祥诗应在四百首左右；钱氏编选了175首，接近一半，基本可以反映该集的面貌。因此，今人若重辑《桐屿集》，不妨以《列朝诗集》为底本，应可辑得二百首以上。又如，闰集卷一选宗泐《徐伯廉归南陵》诗，其颌联“乌啼红树里，人在翠微中”，钱氏批注曰：“‘乌啼’二句，叶子奇《草木子》载之，以为今上佳句，盖讹传全室诗为太祖御制也。《弇州别集》辨为庚申帝作，尤谬。”<sup>③</sup>此诗今见于宗泐《全室外集》卷五，而未见于《明太祖文集》。睹全诗意旨，确为宗泐所撰，牧斋考辨有力。再如，节略于谦所撰《谒古春阑法师塔诗序》的《古春兰公小传》云：“古春法师，先君方外友也。予弥月时，师赴汤饼之会，摩予顶曰：‘此儿他日救时宰相也。’已而，髻髻知学，先君数以师言警余。及登第拜官，恐负师之知言。兹以内艰家居，而师与先君不可复作矣。感时追旧，祇具蔬盘茗碗，展拜师墓，爰赋一律以识予之耿耿云。”<sup>④</sup>于谦所撰之序未见四库本《忠肃集》。于冕《于谦行状》、倪岳《于谦神道碑》以及《明史·于谦传》皆以为古春之期许是在于谦七岁时。《列朝诗集》的此段文字，不仅可补《忠肃集》之佚文，亦可证明古春见于谦时，乃在其“弥月时”。

《列朝诗集》的编撰宗旨是“以诗存人”、“以诗存史”，故尤为注重诗人小传的撰写。这些小传不仅是“诗苑传”，亦是牧斋表达诗史观、建立诗学体系的重要方式，因而历来为人所重视。闰集所收录的108名僧人中，除无方、吴僧善诱、果庵等人外，其余皆存小传。这些僧人小传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例如《梦观法师仁公小传》云：

德祥，字麟洲，钱塘人。……吴之鲸《武林梵刹志》云：“祥公与梦观仁公同参，相与肆力于诗。仁公以南粤进翡翠，作诗寓讽云：‘见说炎州进翠衣，网络一日遍东西。羽毛亦足为身累，那得秋林静处飞。’太祖怒曰：‘汝谓我法网密，不欲仕我耶？’止庵亦以《西园》诗忤上，几不免。”《西园》诗今载集中，不知所忤上者何语？野史流传不足信也。祥公有题倪云林、周履道画

① 《有学集》卷二一《大育头陀诗序》，《钱牧斋全集》，第5册，第892页。

② 《牧斋杂著》，《钱牧斋全集》，第8册，第865页。

③ 《列朝诗集》闰集卷一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1624册，第264页。

④ 《列朝诗集》闰集卷二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1624册，第286页。

云：“东海东吴两故人，别来二十四番春。”又有《为王驸马赋清真轩》诗，则知公生元季，至永乐中尚在也。<sup>①</sup>

所谓《西园》诗，即《夏日西园》：“新筑西园小草堂，熟时无处可乘凉。池塘六月由来浅，林木三年未得长。欲净身心频扫地，爱开窗户不烧香。晚风只有溪南柳，有畏蝉声闹夕阳。”细味全诗，确实很难看出“忤逆”之意。牧斋还根据《为王驸马赋清真轩》一诗，考证释德祥至永乐中尚存，则以诗忤怒明太祖之事，不足为信。又如《蒲庵禅师复公小传》云：

来复，字见心，丰城人。……（洪武）二十四年，山西太原获胡党僧智聪，供称随渤季潭、复见心往来胡府，合谋举事。见心坐凌迟死，年七十三。野史载，见心应制诗有“殊域”字，触上怒，赐死，遂立化阶下。田汝成《西湖志余》则云逮其师诮笑隐，旋释之。见心应制诗，载在《皇明雅颂》，初无触怒之事，而笑隐为全室之师，入灭于至正四年，俗语流传，可为一笑。<sup>②</sup>

明代文献中关于来复之死的记载很多，尤以其应制诗中有“殊域”二字触怒明太祖而赐死，最为盛传。但钱谦益在此则小传中，力辨来复之死非出于“文字狱”，而是因牵连“胡惟庸案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钱氏所依据的材料，是在明代流传极罕的《清教录》。《清教录》刻于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，是明太祖捕杀六十四名“胡党”僧后颁布的清理佛门之书<sup>③</sup>。是书刻成后，明太祖旋命度藏其版，不令广布，即“内阁书籍中亦无之”，钱谦益是“从南京礼部库中钞得”。据钱氏透露，《清教录》记载了“胡党”僧智聪的供词，“供称胡丞相谋举事时，随渤季潭长老（宗渤）及复见心（来复）等往来胡府”，来复因此“坐凌迟死，时年七十三岁”；宗渤则因“素见信于圣祖”，“钦蒙免死，着做散僧”<sup>④</sup>。钱氏的考证言之凿凿，较之野史传闻，显然更令人信服。

历代僧传因未列“诗僧”、“艺文僧”、“诗文僧”之目，故以诗为名但道行平平的僧人很容易淹没于历史尘埃中。明代很多僧人像大持、照源、海旭、志淳、广德等的生平大略，均依赖《列朝诗集》而得以保存下来。此外，闰集所选释氏诗人诗作还能反映明代的佛教政策和僧人的心态史，具有较高的僧史价值。例如，洪武五年（1372），明太祖设蒋山广荐法会，超度亡灵，三千余僧人云集天界禅寺，是明朝建极以来规制最宏的佛教法会。但明初的文献中，仅宋濂《蒋山广荐佛会记》稍详。《列朝诗集》闰集卷二选录了同庵夷简的《钟山法会诗》八首，各首诗题记载了法会每日之要事，连缀起来，其实就是一篇记文，可与宋濂之文互读。再如《冰蘖禅师存翁则公小传》云：

惟则，字天真，吴兴费氏子。嗣法于匡庐无极源公。源告病，归侍佑圣寺，誓不涉世。洪武初，征高僧，白庵金公首荐师，以足疾辞。癸酉仲春，忽告病曰：“吾去矣。”侍者请偈，厉声曰：“平常说底不少耶？”即瞑目而逝。……师有《七幸序》曰：“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八月二十九日晚朝，上命凡天下僧人，但清理册文上有名籍者，不问度牒已给未给，皆要他俗家余丁一人充军。比时在京，钦闻上命，进偈七章，其七曰：‘天街密雨却烦暑，百稼臻成春气饶。乞宥沙弥疏戒检，袈裟道在祝神尧。’或讥之曰：‘无事请死而已。’上览偈，罢军事不果。”后题“洪武乙亥孟秋七月二十日，述于武林松盛坊之客轩”。按师之乙亥岁在武林作此序，则诸书记癸酉入灭误也。《海门和尚祭文》称“前左善世上天竺白云堂上存翁住世七十八年”。则诸书云以足疾不赴召，终老佑圣者，亦误也。进偈佑僧，当在官左街之日，此法门一大事，可以补国史之阙者，故详志之。<sup>⑤</sup>

① 《列朝诗集》闰集卷二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1624册，第288页。

② 《列朝诗集》闰集卷一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1624册，第263—264页。

③ 关于《清教录》的性质，参见白固文《洪武、永乐年间对僧团的全面整顿》，《青海民族学院学报》2004年第4期。

④ 钱谦益《初学集》卷八六《跋清教录》，《钱牧斋全集》，第3册，第1803—1804页。

⑤ 《列朝诗集》闰集卷二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1624册，第304页。



此则小传所载惟则“进偈佑僧”事，在明代的僧史、僧传中，均未见记载；仅后来清人纪荫《宗统编年》卷二八方有类似记载。此事虽得到了明太祖的恩准，却十分清晰地反映了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朝廷陆续颁布《申明佛教榜册》、《周知板册》、《清教录》后，极为酷烈的佛教政策。而“或讥之曰：‘无事请死而已’”云云，则反映出当时丛林浓郁的“惧祸”心态。但需指出的是，牧斋的考辨或小有舛误。明初字“存翁”并担任僧录司左善世一职的僧人是竺隐弘道，而非天真惟则。《列朝诗集·弘道小传》云：“弘道，字存翁，号竺隐，桐乡密印寺僧。……与楚石同被召入京，为僧录司左善世。辛未（洪武二十四年）告老，赐驿驰归。明年秋，跣趺而逝，世寿七十八岁。”笔者仔细排查了《释鉴稽古续集》、《宗统编年》等僧史文献，洪武二十年至二十四年任左善世者是弘道，二十五年是夷简，三十一年是大佑，没有资料显示惟则曾担任过左善世之职。钱谦益又举《海门和尚祭文》，称“前左善世上天竺白云堂上存翁住世七十八年”，与弘道的世寿正相吻合。其实此文应是弘道为海门和尚所撰祭文；而这个海门和尚，就是《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》卷一三中的“海门和尚惟则”。钱谦益在编写惟则和弘道的小传时，一时混淆，将弘道的事迹误植于惟则，所谓“进偈佑僧”事，实竺隐弘道所为。然小小舛误，并不损此则小传的僧史价值。

## 五 总体评价

《列朝诗集》编选释氏诗歌并非尽善尽美，其遗漏、舛误亦不少。例如，成化间释宗贤，号月堂，著有《猷寮集》二卷存世；明末释大善，号虚闻道人，有《西溪百咏》二卷存世，钱氏均弃而未选。尤其是未选释居顶之诗，殊难理解；要知居顶诗文，在明初与宗泐、来复辈“实伯仲間”<sup>①</sup>。又如，闰集卷二收录释宗衍诗32首，其小传称：“宗衍，字道原，中吴人。至正初，善为诗，住石湖楞伽寺佳山水处，一时名士多与游……年四十三而歿。”<sup>②</sup>宗衍卒年实为元至正十一年（1351），下距明朝建极尚有十七年，不当为明人<sup>③</sup>。又，同卷所收怀海《赠北涧和尚》一诗，亦系误收。此诗又见《古今禅藻集》，作“上净慈北涧简和尚”，署名释元肇，收入卷一一“宋七言律诗”。清人厉鹗《宋诗纪事》卷九三《元肇小传》云：“元肇，字圣徒，号淮海，通州人。淳祐中，住灵隐寺，后圆寂于径山。”<sup>④</sup>然钱谦益据《声文会选》，将“淮海”误作“怀海”，又误为明人。诗题中的“北涧”，即释居简（1164—1246），字敬叟，南宋嘉熙中敕住净慈光孝寺，因寓北涧，故号北涧和尚，其集曰《北涧集》。释居简既为名僧，《北涧集》亦非僻书，不知精审如钱氏者何以致误。

世人批评《列朝诗集》最为激烈者，乃在钱氏取舍未允，评骘不公。如未选陈子龙，溢尊程嘉燧，訾警李何、李王等，后人或以为欺世之议、门户之狭。此种瑕疵，在释氏诗部分亦有所体现。前文已述及，牧斋颇倾心于法藏的山居诗，但《列朝诗集》中竟未见其踪影。法藏（1573—1635），号汉月，字于密，梁溪（今江苏无锡）人，著有《山居诗》一卷。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，牧斋撰《山居诗引》云：

已得其（按：指法藏）山居诗，静夜诵之，殆如杜子美所谓“欲觉闻晨钟，令人发深省”者，以此知藏公之所存远矣。《唐高僧传》称杼山皎然，凡所游历，皆以诗句牵劝，令入佛智。而文举居破山寺，用元和体著《青山履道歌》。两公飞锡之地，比在虞山，皆以诗句作佛事。藏

① 杨士奇《圆庵集序》，释居顶《圆庵集》，明初刻本，第1a页。按，《圆庵集》十卷，今传本甚稀，上海图书馆藏卷一至卷六，天一阁藏卷七至卷一〇及附录。

② 《列朝诗集》闰集卷二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1624册，第297页。

③ 关于宗衍的生卒年，参见杨镰、张颐青《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》，《北京工业大学学报》2003年第1期。

④ 厉鹗《宋诗纪事》卷九三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485册，第771页。

公庶几近之。……读《山居诗》，想见其根性猛利，机锋自尔溢出也。心死如灰，根利如火，无火宁复有灰乎？火之种性，生而有光，千年之幽谷，破于一灯杲然，在于用光也。是诗也，以征诸藏公之种性，其亦千灯之一枝也与？<sup>①</sup>

但二十余年后，钱氏编选《列朝诗集》竟全然无顾法藏之诗。究其缘由，即在二人之交往，经历了从密切至恶化的过程。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，法藏住锡虞山北麓三峰清凉禅寺，与钱谦益酬答唱和。万历四十七年，憨山德清拟请法藏至庐山归宗寺，钱谦益寓书德清，坚决劝留，说：“敝邑佛法衰微，赖汉师力振宗风，衲子中始知有本分事。今闻邢公与师（按：指憨山大师）将遂邀往匡庐，一二有血性男子，空群而行，是不特撤三峰法席，并撤此方佛法也。”<sup>②</sup>俨然视法藏为一方法幢。然数年后，法藏因不满乃师密云圆悟所倡导的“自性自悟”说，极力提倡祖师禅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辩。此为晚明禅史上著名的“汉密之争”。汉密之争，时论多向圆悟，“汉公之跋扈，士庶咸恶而薄之，太史钱牧斋特甚”。钱氏批判法藏及所创“三峰宗”云：“自国家多事以来，每谓三峰之禅、西人之教、楚人之诗是世间三大妖孽。三妖不除，斯世必有陆沉鱼烂之祸。”<sup>③</sup>平心而议，牧斋苛责法藏的禅学，自有其道理在，但因此而牵涉其诗，则是因人废诗，有失“以诗存人”之旨。

尽管如此，《列朝诗集》所选释氏诗歌的价值不容否定，像四库馆臣所评“以记丑言伪之才，济以党同伐异之见，逞其恩怨，颠倒是非，黑白混淆，无复公论”<sup>④</sup>，自非持平之议。前贤常将《列朝诗集》与朱彝尊《明诗综》相比，以评掂其得失。笔者亦将二书编选的释氏诗歌进行对比，希望予以较为公允之评。可比较者，约有如下数端：

一、《明诗综》卷九〇至卷九二选录108名释氏诗人诗作341首，《列朝诗集》选录108人1349首。二者所选诗人数量相当；但在诗歌总量上，《明诗综》仅为《列朝诗集》的四分之一，文献的丰富性显然更弱。

二、《明诗综》所选僧人诗作最多者依次为宗泐（37首）、梵琦（30首）、守仁（28首）、德祥（25首）、智舷（13首）、妙声（12首）、明秀（10首）、来复（9首）、读彻（7首）、函可（7首）、方泽（6首）、斯学（5首）、无文（5首）、实訥（5首）、文湛（4首）、德清（4首），余者皆不足四首。寥寥数诗，非特难尽诸僧之所长，亦如容庚先生所言：“如读者非别有各家之诗集在，只读此书，得无有甄录太少之感乎？”（《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》）

三、《明诗综》的僧诗史价值亦不如《列朝诗集》。《明诗综》选诗五首以上的释氏诗人中，明初6人，明中期4人，明末4人，实难反映出明代僧诗发展的大势。特别是对开启晚明丛林尚诗之风的雪浪洪恩仅选两首，尤为未协。

四、即僧人小传而言，《列朝诗集》远较《明诗综》更为详细。《列朝诗集》僧人小传多则达千余字，一般皆有百余字；而《明诗综》则一般仅数十字，极少考辨综核，史料价值不如前者。

五、《列朝诗集》虽间有舛误，但《明诗综》的瑕疵亦不少。例如，《宗泐传》将其所授僧职误为“左善世”<sup>⑤</sup>，实为“右善世”。又如《善启小传》中，仅据敬修诗句“昔出当严冬，兹还及春暖”，推

① 《牧斋杂著》，《钱牧斋全集》，第8册，第864—865页。

② 此信未见载于《钱牧斋全集》，转引自汉月法藏《三峰藏和尚语录·三峰和尚年谱》，《嘉兴大藏经》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版，第34册，第207页。

③ 关于“汉密之争”的始末，参见陈垣《清初僧诤记》卷二《天童派之诤》，《明季滇黔佛教考（外宗教史论八种）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514—515页；连瑞枝《汉月法藏与晚明三峰宗派的建立》，《中华佛学学报》1995年第9期。

④ 永瑢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九〇，中华书局1995年版，下册，第1730页。

⑤ 朱彝尊《明诗综》卷九〇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8册，第4263页。

考《永乐大典》编纂“盖不过数月事尔”<sup>①</sup>，尚欠精审，已为张宗泰所辨。更令人难以思议的是，《明诗综》所选之诗，常脱漏成句。例如，选德祥《古怀诗》：“思寻海底人，为乞珊瑚树。持栽此庭前，颜色长不故。”而《列朝诗集》此诗作：“思寻海底人，为乞珊瑚树。持栽此前庭，慰彼岁将暮。上栖孤金禽，下宿单玉兔。四时相并辉，颜色长不故。”《明诗综》遗漏了其中四句。又如，选德祥《答香光居士》：“山北山南住，鸡声隔一峰。新诗忽寄到，犹胜一相逢。”此诗实为五律，遗漏了中间两联：“片云长自合，明月有谁同。拄杖鸣禽润，开门落叶风。”因此，在版本校勘价值上，《明诗综》亦不如《列朝诗集》。

六、朱彝尊对僧诗的看法仍是传统之见，例如，他评大问“妙止诗格未高，然已脱蔬笋气”<sup>②</sup>。而钱氏则不循常见，持论独到。

七、朱彝尊编撰《明诗综》，因间缀诗话，述其本事，故对僧诗风格的评点，较《列朝诗集》更具价值。例如，评宗泐、来复诗云：“蒲庵与全室齐名，然不及全室远甚。盖全室风骨戾削，而蒲庵未免痴肥也。”可谓的评。同时，《明诗综》收录了近四十名《列朝诗集》未收之僧人，尤以晚明为多，补阙之功，亦不容磨灭。

朱彝尊因不满明诗选本之弊而撰《明诗综》，称它们“不加审择，甄综寥寥”，“意在补当时选本之阙漏”<sup>③</sup>。今观《明诗综》与《列朝诗集》所选释氏诗歌，朱彝尊未免心气过高。盖朱氏佛学修养远不逮牧斋，与丛林交谊亦非深厚，故《明诗综》虽后出，转精之效，则尚不足论矣。要之，若研究明代释氏诗歌，于茫茫文献中，《列朝诗集》不失为渡河之筏。

〔作者简介〕李舜臣，江西师范大学当代文艺形态研究中心教授。发表过论文《20世纪僧诗文献研究综述》等。

（责任编辑 马 昕）

① 《明诗综》卷九一，第8册，第4319页。

② 《明诗综》卷九一，第8册，第4320页。

③ 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卷三三《答刑部王尚书论明诗书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第1318册，第26页。